



Working Paper No. 201907

June 19, 2019

##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Global Governance Panel 将持续追踪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定期收集整理全球治理研究领域权威成果推送分享



Tyler Pratt. 2018.

### Deference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gime Complex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No. 3, pp. 561-590.

---

\* 执笔：黄宇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彭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在本文中，泰勒·普拉特（Tyler Pratt）分析研究了制度顺从（institutional deference）是如何应对国际制度间存在的管辖权冲突/重叠（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overlap）问题的。根据作者的定义，制度顺从是指一个国际组织（IO）对另一个国际组织权力/权威（authority）实践方式的接受，这种顺从往往发生在由不同国际组织所共同关注的同一个政策领域。制度顺从对实现多边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顺从主要受机制复合体中（regime complex）制度间管辖权冲突所驱动，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与无效复制（inefficient duplication）两种形式。前者会造成各国对现行（高标准、高负担）国际规则、规范和标准的遵守程度大大降低；后者则会导致无效成本（inefficiency costs）且限制机制复合体中国际组织的生产力。面对这些挑战，相较于国际组织规则的调和化（harmonization of IO rules）与不同国际制度的正式统一（formal unification of disparate institutions），制度顺从路径更加具有可行性。

具体而言，作者把制度顺从分为两个模型。其中之一是“功能效率”（functional efficiency）模型。在该模型中，国际组织更倾向于对技术性制度或关注具体问题的制度（而非政治性制度）进行顺从。该模型有利于克服谈判僵局、汇集专业知识、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有效规则；另一个是“成员国权力”（Member State Power）模型。该模型强调，顺从是在监管权力的作用范围上达成某种协议，即围绕谁的规则将得到普遍执行进行讨价还价。制度顺从不仅能够导致机制复合体中多个国际组织之间在某一个具体问题领域（例如反恐）实现一定的协调分工（division of labor），同样会导致国际制度间形成一定的权力/权威等级（hierarchies of authority）。



本文的最大贡献在于其首次系统阐述了国际机制复合体中的制度顺从问题，这种努力对机制复合体中对于合作的悲观倾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这种反驳主要基于作者对于国际制度有效性评估标准的更新性认识。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作者认为，在统一机制（unified regime）内，制度的有效性判断主要基于合作的深度（depth）；然而，在机制复合体中，有效合作不仅强调合作的深度，同样强调制度间协调（inter-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即通过制度间的互动情况——本文所关注的制度顺从便是其中一种情形——对合作进行评估。



徐秀军：

##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

《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第28-39页

全本文开篇剖析了全球经济治理形势正在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包括主体作用发生变化、参与理念出现分化、实现途径经受挑战、以及规则体系面临重构。基于此，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生力量，中国在提升其全球经济治理参与度和影响力方面可以重点把握以下几点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奠定新基础、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多元化为扩大中国理念的吸引力提供新契机、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新一轮创设为中国方案的实践提供新舞台、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系统性调整为中国优势的发挥提供新空间。与此同时，本文同样指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制度性约束更加明显（话语权受限）、阻碍性力量有所加大（发达国家谋求新一轮规则制定权）、支撑性平台作用有限（进展缓慢、影响有限）、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黑天鹅”事件、“逆全球化”思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贡献在于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几条参考性路径与思路，包括（1）改革与创新并重，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2）创造南南经济合作的新动力，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主张的影响力；（3）加强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务实机制的作用；（4）重视议题设置，进一步提升发展问题的地位；（5）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构筑经济安全防护网络。



**Kenneth W. Abbott, Jessica F. Green and  
Robert O. Keohane. 2016.  
Organizational Ec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0, No. 2, pp. 247-277.**

近年来,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跨政府间网络(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私人跨国监管组织(private transnational regulatory organizations)等新型国际制度大量涌现,而传统的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增长率却出现下滑。根据组织生态学理论,本文围绕着组织(organizations)、群体与生态位(populations and niches)、组织密度(organizational density)三个概念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文章假设建立与维持国际组织所需要的资源都高度相似,所以国际组织间需要相互竞争以获取有限资源。相对于传统的政府间组织,私人跨国监管组织具备三个优势而被广泛运用。第一,其运营成本更低,因而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第二,其组织架构更加灵活,因此可以战略性地调整组织定位,以抢占有限的生态位;第三,私人跨国监管组织同样可以通过和传统政府间组织的合作,来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通过该理论,文章的案例分析部分解释了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私人跨国监管组织在近年来大幅涌现的现象。

本文的贡献在于相比于传统理论从某一组织建立者的角度进行分析,组织生态学理论突破性地从国际组织的整体结构入手,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



庞中英：

《效果不彰的多边主义和国际领导力赤字  
——兼论中国在国际集体行动中的责任》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4-18页

全球化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达到新的深度和广度，而国际多边主义是当代世界管理相互依存的主要途径。本文在强调多边主义重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多边主义效果不彰的现象和成因，并探讨中国可以为加强国际合作承担怎样的责任。文章指出，多边主义的价值、效率、有效性使得其成为一种最基本的世界共识。但与此同时，很多多边进程难以取得实效或进程不理想，国际治理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究其原因，是缺少国际领导力的存在，即不仅是军事暴力的决定性权力，而且是获得被支配者对他们所受支配的道德认同的能力以及行使知识和道义领导（intellectual and moral leadership）的能力。尽管世界霸主美国带头建立了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多边制度，但当多边主义的倡议与美国自身利益相冲突时，美国就不愿意发挥国际领导力的作用。

本文强调，随着诸如新兴经济体等行为体的增加和共同挑战的复杂性增强，国际社会有必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集体领导，以增强多边主义效益。对于中国而言，尽管国内学者仍在“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徘徊，但作者认为在这一国际制度新旧转换的时刻，中国需要为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做好准备。结合现实条件，本文最后为中国参与国际集体领导提出六点探索性思考，包括加强国际领导问题学科建设、通过国际制度稳定与世界的关系等。



###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

任琳 宋锦 鲁桐 吴国鼎 熊爱宗 刘玮 沈陈

### **研究助理团队**

彭博 黄宇韬 兰馨彤 孙振民

责任条款：本报告仅供内部讨论，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有违反，我们保留追责权利。本报告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